

新邵文史资料

第二辑

目 录

- 湖南“南学会”在邵阳的活动……………陈新宪（1）
- 樊锥小传……………刘伯禄（10）
- 回忆大革命前后新邵龙山太芝庙的革命运动…陈新宪（12）
- 宝庆乡村最早的新式学校……………李富国（21）
- 龙山暴动……………陈新宪（29）
- 龙山金锑矿的历史与现状……………贺道荣（37）
- 新邵锑冶炼……………周德安（44）
- 胜利煤矿的诞生及其历程……………季夫、吉星（50）
- 新邵酒厂史略……………曾必祥（54）
- 新邵麻鸭……………李 键（59）
- 新邵黄心生姜……………李宗元（66）
- 石马江流域梯级开发……………张健康、黄双喜（71）

| | |
|-----------------------|---------------|
| 白云岩源考略..... | 朴 愚 (78) |
| 龙山罗汉寺与古岳观..... | 黄叙伦 (85) |
| 酿溪镇的变迁..... | 陈希桥 (90) |
| 新邵第一镇——大同镇..... | 张步瑜 (94) |
| 我在“工合”的回忆..... | 唐甫之 (100) |
|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 刘 凡 (109) |
| 抗日时期我在滇缅边境远征军的回忆..... | 潘 铨 (116) |
| 国民党兵团司令——李文..... | 李维培 (124) |
| 台湾基隆市长谢贯一..... | 龙芳燎 (136) |
| 邓耀楚与景中中学..... | 南 玉 (141) |
| 黄呈祥事略..... | 黄叙伦 (144) |
| 辛亥宝庆都督谢介僧..... | 蒋宁、钟纯祖 (149) |
| 抗日爱国将领高济川..... | 毕德恩 (152) |
| 忆唐麟..... | 唐甫之 (157) |
| 一代良医刘晓沧..... | 周乐道、李家和 (168) |



湖南“南学会” 在邵阳的活动

· 陈新宪 ·

湖南南学会总会正式成立于1898年1月，会址设长沙省会巡抚部院，邵阳分会则成立于同年2月，会址设邵阳城内孔庙。

1887年系丁酉科乡试之年，湖南各府、州、县士子均集中省会长沙应试，有一些人曾酝酿组织各种学会。这时谭嗣同奉委回湘筹办粤汉铁路，并积极开展变法运动，便向巡抚陈宝箴建议设立南学会。陈答应了，同时又得到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的支持。当时名流学者皮锡瑞、熊希龄、唐才常、樊锥、邹代钧等积极参与创办，不数月先后入会者达一千余人，经巡抚遴选十人为总会会长，再由各总会会长就自己所知和朋友们所介绍的，选“好义、爱国”之人吸收为会友。樊锥是邵阳人，被遴选为总会会长之一。

南学总会于1898年1月成立后，樊锥即于是年2月春节前夕赶回邵阳。他家住樊家冲（现属新邵县段塘村），利用春节在城厢内外串连，于元宵节集邵阳会友在城里孔庙大成殿正式成立南学会邵阳分会。樊锥以总会会长兼分会会长，

当即宣布南学会宗旨：“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体，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办起，盖兼学会与他方议会之规模焉。”随即开展讲学运动，地址不一定，讲学的都是南学会邵阳分会骨干分子，除樊锥外，有陈玉成、肖坤、滕骥、石公溥、石广权、岳卓如等。这几位以陈玉成年齡最大，樊锥、石广权是同年，功名多是贡老爷。他们讲学内容，虽然有的讲正教，有的讲学术，有的讲天文、地理，有的讲生理健康等，但基调一致都是“匡时济世，救亡图存，革除旧习，提倡新法，移风易俗，振兴国家”。樊锥当时常奔走于邵阳和长沙之间，是年《湘报》创刊后，不断在《湘报》发表言辞激烈的文章，其中以《开诚篇》和《发锢篇》为最著。

《湘报》当时是南学会的宣传阵地，传播很广，南学会邵阳分会根据《湘报章程》征求报友，造册注明姓名、籍贯、地址，按日送报，不收报资。报友遍布城乡，可说有南学会会友的地方就有《湘报》报友，至于城乡要道和祠庙、庵堂大都张贴有《湘报》。《湘报》的传递从长沙到邵阳，大多赖当时的民信局寄送给南学会会友，再由会友分送报友。《湘报》的创办，是“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发表了不少提倡维新变法的论著。其中《开诚篇》、《发锢篇》及易薰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措词激烈，义正理直，受到顽固守旧分子的攻击。

先是在湖南省城长沙的顽固分子王先谦、叶德辉等，纠集多人，于1898年5月间联名函请在北京的湖南同乡官

吏，请参奏推行新政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臬司黄遵宪。而邵阳顽固守旧分子举人曾廉，亦于5月间(农历4月15日)，纠集一些同伙窜进学宫大成殿，向孔子牌位祷告，立将樊锥驱逐出境，并诬樊锥为“乱民”，张贴《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告白说：“立驱逐乱民字人邵阳士绅军民等，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真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列刻逐条，四处张贴，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邵阳并无异论，特此告白。”

当时顽固分子的上告，不但没有获得应准，反而受到正意欲变法的光绪帝的训斥。

鉴于邵阳曾廉等猖狂进攻，樊锥等便转移讲学阵地，向四乡扩展。先在白云庵，后到太芝庙(均在今新邵县境内)。从长期保留在我家的《南学会邵阳分会会友录》、《南学会会友唱和集》、《会友讲学录》、《学约》及信札、和解放后在唐献后人唐志锐家见到的有关南学会邵阳分会的资料(唐献是樊锥的学生，南学会友，他跟我父亲是儿女亲家)，樊锥在白云庵讲学时间是1898年戊戌政变之前五至十月，唐献有详细的记录，并有唱酬诗集，听讲人约二十左右。七月间一次讲学，有三十余人听讲的记载。经常驻在白云庵的有十余人，如：唐献、李洞天、肖坤、滕骥、岳卓如、李笏山、何锡伯、孙复诚、陈佩纯、傅范新、简政、黄怀民等。

这些人大都是樊锥的私淑弟子。在他们彼此的唱和集中都称樊锥为樊师。我祖父陈玉成守制在太芝庙，未去白云庵。

邵阳的顽固分子曾廉等，当时得到省城顽固分子和地方官吏中的守旧势力的支持，竟于七月间上书光绪帝，反对变法维新，谓“康有为、梁启超乃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人”，要求光绪帝杀康、梁以塞邪慝之门。这时正值维新派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人在清廷中开始任军机处四品章京（办理文书的官员），参预新政的时候，认为曾廉诽谤新政，应当杀之，但光绪帝未允。

9月21日，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康、梁逃走，谭嗣同等六人被杀，湖南巡抚陈宝箴被解职，维新事业均一律停止，南学会亦被取缔。邵阳南学分会会友，有少数开始动摇、退隐，但多数仍坚持信心。由于政治上突然变化，他们不得不采取分散活动的办法。约在这年十月间，樊锥应易易乡陈玉成与和安乡石公溥（石醉六之兄）之邀来到龙山脚下太芝庙。同来的还有石崑山、岳卓如、肖坤、唐猷数人，他们分别住在永春堂、德星堂和庙边新院子。樊锥仍继续讲学，游岳屏峰、老龙潭，垂钓邵水源。据当时记录资料，特别是在龙山会友唱和集里的记载，讲学活动大都在新院子彩楼上。新院子宜字班有兄弟四人，彩楼这一边是鹤皋（第七）和春皋（第八），彩楼主人是春皋。鹤皋和春皋都参加了南学会。老院子（德星堂）这时参加活动的有陈整（尔翼）、陈纯如、陈新传、陈卓甫、陈裕生、陈郁文等数人，其中以陈纯如较年轻，最积极。

樊锥这次来主要是避风险、观动静，但并没停止他的宣传工作，意志很坚强。他母亲出于陈门，他跟我祖父陈玉成私交很深。我祖父十七岁进学，比他大八岁。他和石蕴山是同庚，我祖父跟石公溥是同年进秀才，石比我祖父小一岁。石蕴山（广权）、岳卓如、唐规年都与我家先辈有亲，故他们对我祖父比较尊敬，有的是入门弟子。故我祖父和石公溥邀樊锥等来太芝庙避难，他们纷纷欣然而来。这时清廷追查康、梁余党之令尚未到达，太芝庙又处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区，民风淳厚，历史上常成为政治避难场所，故在太芝庙仍能公开活动。

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新化巡抚俞廉山与当时的顽固守旧分子一鼻孔出气，藉慈禧拉那氏追查康、梁余党之命，进一步迫害南学会成员。邵阳的顽固守旧分子则大造舆论，谓南学会分子仍在“造乱”，要求宝庆官府查究。南学会里面也有一、二人出来反对南学会所宣传的主张，他们与省城王先谦、叶德辉、苏屿等相呼应。邵阳南学会的头面人物便策划远走高飞。我祖父陈玉成便将永春堂全部山土田产两兄弟分开，我大祖父分得铺面改为恒春堂。祖父把自己分得的全部卖掉，与樊锥、石公溥等于1899年春节后离开太芝庙，在长沙未停留，到南京大胆上访两江总督刘坤一。刘当时对宝庆同乡人尚能礼贤下士（樊锥是拔贡，我祖父也是附贡生，石公溥是当时名士）。樊锥当时便趁机向刘坤一递条陈，刘当时未露声色，劝樊、陈、石等先出洋考察。我祖父因刘劝而先东渡日本。我高祖富春（字万书、号济乐），是

新宁二刘（刘长佑和刘坤一）的老师，殁于刘家，葬于刘长佑祠后，与刘家有世交之谊。石被刘介于江西，樊锥被刘介于湖南巡抚赵尔巽。樊返湖南，开始得赵的器重，条陈广兴学校，言听计从；旋又建议设立兵工厂以防兵变，预谋湖南能独立存在，引起赵的疑惧，斥樊为狂士而逐之。樊不得已再赴南京，求见新任两江总督魏光燾。魏以乡谊亦礼遇之。樊更大胆提出惊人建议，劝魏统率湘军，割据东南，自立为王。魏光燾未置可否，修函转介给北洋大臣袁世凯。樊向袁慷慨陈词，袁心领神会，颇为赞赏。樊进一步劝进，并曾撰诗赠袁，有“兴汉还须望本初”之句。袁以樊太露，恐泄天机，便赠以重金，劝樊出洋，樊随即赴日。

这时适我祖父毕业于明治大学警政科，见樊来日，便继续留学，考入法政大学特科，二人同寓东京早稻田附近“月印精舍”。樊锥入东京成城学校，在东京倡言种族革命。这时，原邵阳南学会会友亦先后得陈玉成和樊锥的函召纷纷渡日，有太芝庙的陈整、陈纯如、陈卓甫、陈新泉，东岳村的石蕴山，大树村的石醉六，半边街的岳卓如，田心村的刘武，邵东西洋江的肖坤，花园村的刘猷，湾泥渡的李笏山，牛马司的刘幸刚，两头塘的贺民范，范家山的刘校书兄弟，邵阳城内外的谭心休、马邻翼、唐猷、滕骥兄妹等。当时宝庆府邵阳县籍留日学生约六十余人。论年龄以谭心休为最大，其次是马邻翼和我祖父陈玉成（他两人是同年同月的同庚），年龄最小的是刘宝书（不是南学会会友）。论功名也以谭心休和马邻翼较高，二人都是举人，其他有较多的贡老

爷，即拔贡、副贡、岁贡、优贡、恩贡。也有秀才、廪生，也有无功名的，也有政治避难的。我祖父和樊锥在日本时生活比较宽裕。樊得力于袁的一次馈赠，我祖父除卖了全部家产，并先后得到刘坤一和魏光焘的资助外，1901年又补入官费，因而有钱资助家乡亲友留学。除太芝庙的侄儿陈整、侄孙陈纯如外，还资助过唐猷、李笏山、石蕴山、刘幸刚、罗金声等人。他们后来归国腾达多报恩于我父亲陈治身上，使我父亲从一个只读了几年私塾的店员能干上一辈子财政税务局长。

邵阳南学会会友到了东京后，大多数都先后参加了孙中山和黄兴领导的同盟会。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邵阳人第一批参加的有陈析清、陈惠、袁公诚、刘馥、梁鏊、李果、唐公懋、张大宗、向忠勤、唐公哲、华同、袁演、刘虞、姚诚、刘谊、周志伊等16人。这16人原籍属现在的邵阳市新邵、邵东、邵阳三县和市区，不包括解放后新化划进新邵、隆回和武冈划进隆回、邵阳的留日学生。蔡愕先年从士官学校毕业已回国，没有在东京加入同盟会。樊锥和我祖父陈玉成这时在东京也没有参加。从遗文、遗诗、遗札来看，没有发现樊锥、陈玉成跟孙中山接触的资料。孙中山当时住横滨，不在东京，同盟会成立先月来东京，据说参加过欢迎会，但跟黄兴、秦力山、杨度等来往较多。

樊锥在东京曾参加军国民教育会，参与编写湖南编辑社的《游学译丛》。旋因考在成城习陆军，练习骑射时坠马受伤，引起肺部吐血，在东京小石川一家医院诊治约二月余，

便于1906年春辍学返国。回湘后应蔡锷之邀赴广西协办巡警学堂。因创办事务甚繁，肺病又发，日趋严重，由蔡锷资送回籍，于1908年春，在邵阳市樊家冲逝世，享年三十七岁。樊锺虽寿年不长，但在三十岁前培养人才甚多，辛亥革命后，邵阳知名人士大多出于其门下，可谓一代宗师。

我祖父陈玉成从1899年与蔡松坡同时赴日，至1907年返国，约八年半的时间，进入两个专科（商业和医科）、两个大学（明治和法政），在法政则与杨度同班。他虽没有加入同盟会，但在1906年《民报》周年纪念会上捐了钱。1907年返国之前，资助过黄兴，谓“疾午来求援，凑集三百金以济之。”他还参加秦力山的正气会，并偕秦力山出席1902年在东京召开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也是东京神田青年会的筹办人之一，又是湖南留日同学会发起人。他既与同盟会人有交情，又与保皇立宪派人有往来。辛亥革命后，既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后来也没参加国民党，终其身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我父亲和大哥于1924年赴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他表示支持。我于大革命时期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投入革命洪流，他也表示欣然。我时常献送《中国青年》、《响导》、《新青年》一类革命刊物给他，他也浏览。1926年秋，当他患病时，我寄给他一本刚出版的《五年来之中国共产党》。他扶病回我一信，记忆犹新，大意是：睹来信及附寄书刊，欣悉一切，尔辈既不生于六十年前，又不生于六十年后，时代

赋予尔辈之使命重而且大，当今应速求南北之统一，谋国家民族之富强，兴教育以启民智，举实业以裕民生，内修政治，外御强权。余老矣，无能为之，尔辈其勉之！此嘱。这是他最后一封信，是绝笔，也是遗嘱，这封信被我父兄保存二十五年，我继续保存近二十年，终难免毁于浩劫。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祖父是旧知识分子的清高典型，留学日本近九年，进了四个大专学校，由商科到警政，由法政到医科，最后还是医德胜于政绩。他于1906年秋应蔡锷之邀赴广西，先后任柳州监考官、庆远府（今桂林）巡警教练所所长，辛亥革命返乡，筹办学校，随即赴云南任都督府医官，昆明、大理县丞，1916年返湘，任五区（永州）菸酒公卖局长。先后受门生唐猷、刘武之请，边从医边从政。自己时感南北纷争，时局危急，不求闻达，愿为良医以济世救人。生平喜作诗，好藏书，惜丧失，其文仅存三修《陈氏族谱》内一跋，亦足见其生平和思想言行。

[作者系邵阳市政协副主席，文史工作老前辈，现年八十二岁]

樊 锥 小 传

· 刘 伯 禄 ·

樊锥，字文谷，号春渠，生于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二十六日，邵阳东乡段塘（今新邵县雀塘乡段塘村樊家冲）人，出身贫苦农家，少年才气过人，清光绪丁酉（1877）年维新派江标任湖南学政，选为拔贡，鼓吹维新，曾自联言志曰：顶天立地三间屋；绝后空前一个人”。一时被人称为“狂士”。曾设馆于邵阳雪压岭（今邵阳市沿江桥北山坡上），蔡锷、岳森、周磐等名人，均曾出其门下。

1898年1月谭嗣同在长沙发起组织“南学会”，并创办《湘报》，樊锥积极参与筹组，开展活动，曾在《湘报》上先后发表《开诚篇》、《发锢篇》和《劝湘》等针砭时弊的犀利文章，痛陈当时亡国的危机四伏，指出两千多年来的愚民政策“沦肌浸髓”、“桎梦桎魂”，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是“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苔莓然”。他大声疾呼：救中国必须“四海一心”，“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他认为“穷极生变，郁极生

智”，满怀信心地预言中国人民一定会奋起革命的。他还主张要大力开展民族工业，抵制“洋货之倾销”。

“戊戌变法”期间，樊锥担任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在家乡宣传变法，提倡新学。邵阳的顽固派大为惊恐，恨之入骨，以举人曾廉为首，纠集一伙守旧顽固分子，在学宫大成殿集会，诬樊“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并发布《邵阳市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

面对顽固派的迫害，樊毫无惧色。“戊戌变法”失败，他应陈玉成之邀，到龙山脚下太芝庙（今属新邵县）避难，仍积极讲学，宣传维新思想。1899年春节后离开太芝庙，两下金陵，先后游说刘坤一、魏光燾，南北奔走，浚胆条陈赵尔巽、袁世凯。后来东渡日本，在成城习陆军时，坠马受伤，肺部吐血，治疗数月。1906年辍学返湘，应蔡锷之邀赴云南办巡警学堂。1908年肺病复发，蔡锷资送回籍，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享年三十有七，真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

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樊锥文集》，流传后世。

回忆大革命前后新邵龙山 太芝庙的革命运动

· 陈新宪 ·

我老家在新邵县龙山脚下的太芝庙。大革命时期太芝庙称易易乡，隶属于宝庆县。一九二六年秋未冬初，龙山、太芝庙相继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地下支部，是今新邵县辖区内建立共产党组织最早的地方。

龙山、太芝庙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清光绪二十八年（义和团运动后两年），贺金声、粟道生、刘兆鹏等领导农民起义军占领过宝庆城，贺金声被诱捕遇害后，刘兆鹏率一支起义军队伍，曾在龙山脚下的马家岭和宁家岭安营扎寨，在龙山人民的支持下，抵御官府的进剿。辛亥革命前，太芝庙有一位中年医师、五位青年书生，因参加了主张革新政治的“南学会”，被满清政府通缉而东渡日本，后分别考入东京明治大学、陆军士官学校和测绘学校，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们学成回国，在太芝庙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率先剪掉辫子，烧掉庙里的菩萨。五四运动时，同匡互生一起火烧卖国贼曹汝霖住宅（赵家楼）

的“北大闯将”陈动和，也是太芝庙人，因被反动军警毒打致伤，后不久去世。民国初期，龙山矿区工人与附近农民又于一九一六年联合举行了一次大暴动，反抗矿主的欺压，万多农民分三路冲上矿山，放火焚烧了矿区各公司，并将躲藏在窖洞的经理李某拖出投入火中烧死，有民愤的把头也被惩治。火烧龙山的首领陈养吾兄弟等在暴动失败后逃往外地，直到农民运动兴起时才重返故里。太芝庙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连绵不断，先辈们为追求真理、争取解放走过了漫长的路程，也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26年9月，宝庆中共党组织派郇建农（省农运特派员）、顾群（省工运特派员）到龙山、太芝庙一带开展工作，首先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贫农陈致清为支部书记、贫农陈吉甫为支部委员、半自耕农李融峰为宣传委员，党员有贫农陈定楚、下中农陈文山、自耕农陈吉三、赤贫小知识分子陈策民等。再以党组织为核心，发动农民群众成立了代表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易易乡农民协会”。委员长陈致清，组织委员陈吉甫，财务委员李融峰，文牍兼宣传委员陈策民，调解委员陈文三、李用九（党外），纠察队长陈吉三。纠察队员大多是党外青年农民。农会还设立粮食管理委员会，聘请开明绅士陈文生、陈伯泉主其事。

这个农会，是当时宝庆最先成立的少数农会之一。他们进行了以下几项斗争：

一、召开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摧毁陈容和操纵的假农会，成立农民自己的真农会。

二、活捉陈容和，送县惩办（到宝庆后即买通押解人员脱逃）；查封了他在枫梓庙开设的店铺“利盛华”。

三、清查祠产庙产积谷，不容劣绅把持。

四、把收到的豪绅罚款，用以到外乡购买粮食，平糶给农民；查收地主的屯粮，平糶给农民。

五、进行反英、讨吴宣传，举行过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

六、广泛发展农会会员，组织纠察队站岗放哨，防止、打击豪绅的破坏活动。

七、严禁赌博，严禁吸鸦片。

八、支持妇女的解放斗争，提倡剪辫子、放小脚，制止虐待童养媳。

九、“四一二”叛变后，进行反蒋、讨奉大宣传，揭露国民党右派“左社”分子的阴谋。

自从闹起了农民协会，一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开始扬眉吐气，而趾高气扬的土豪劣绅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有的逃往长沙，有的逃到城里，有的躲在亲戚家，都不敢露面。

1927年马日事变后，党组织派我来宝庆时，农民运动已经受到反动派的镇压。我原在长沙兑泽中学读书，1924年经田波扬、段消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寒假，李维汉、田波扬在长沙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兑泽中学党、团支部书记。1926年任国民党长沙北区特别党部常务委员，共青团长沙地委和团省委

宣传委员，省市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那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为了革命需要，很多共产党员成为跨党党员。1926年9月，我调任湖南省总工会工运特派员，随后调衡山地委任宣传部长兼管工运和青运。1927年4月，代理衡山地委书记，5月，兼任衡山军委书记。“马日事变”后率衡山部分工农武装转战岳北、南岳一带。七月赴省委汇报工作，省委派我来宝庆调查马日事变后陈光中等匪部屠杀农运骨干和破坏党组织的情况，并与潜伏的同志接上关系。我回到宝庆，宝庆党组织已遭到严重破坏，或捕、或散，仅只彭觉如、王昌明数人没走，但与省委已失掉联系。我到宝庆四乡调查以后，回到了太芝庙。这时乡农会已停止活动，但人员大都未散，只是不敢露面。农会委员长陈致清躲在后山，夜里出来探听消息，我到家第二天晚上，他便向我汇报了党支部与农会建立后和目前的情况。我八月下旬到省委汇报，随又被派回宝庆协助贺恕建立中共湘西南特委会，贺任书记，我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这时我经常到各地去工作，仍以龙山、太芝庙为活动据点。这里地处偏僻，反动派鞭长莫及。我们先后培养和发展的周顺喜、陈顺喜、周玉喜、贺知识、陈庙一等十多位同志加入共产党组织，并在庙边新院子办了一个补习班，以文化补习班作掩护，暗中向学员们宣传革命道理，培养革命骨干。补习班从1927年冬办到次年5月。

陈容和外逃返乡后，当上了黑田铺区团防的联防局长，多次想找我们的岔子。由于群众的掩护，特别是当时有一些